

# 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黄梅波 朱丹丹

**摘要:**文章以经济增长动力因素为主线,以“中等收入陷阱”为出发点,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逻辑关系。文章首先结合国家样本和国际经验,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经济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经济转型路径,包括平衡需求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政府治理能力等。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经济增长;中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5)04-0005-08

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造成经济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停滞增长,难以突破1万美元的发展困境。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和集中爆发的敏感期,往往伴随着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很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413.6美元,进入经济增长“起飞阶段”;2010年,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4433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高度敏感期。更严重的是,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显现出一些与“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相伴随的特征事实,如经济增长

速度连续放缓、贫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就业问题日益严重、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等等。正因如此,中国能否顺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经受到中国政府部门、学术界、业界的广泛关注。鉴于此,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和教训、探寻中国避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和方法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就是经济发展的停滞,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缺少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因此,从经济发展动力因素出发,通过对陷入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样本的考察和对比分析,可以从一定层面窥探一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不过,由于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不同,这就意味着,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长期平稳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以经济转型开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因此,本文以经济增长动力因素为主线,以“中等收入陷阱”为出发点,试图阐

**作者简介:**黄梅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丹丹,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世界经济博士研究生。

释:经济转型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并据此提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经济转型策略。

### 一、经济增长动力与“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需求方面主要包括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供给方面主要影响因素有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制度质量、金融发展水平等等。本文选择部分指标对一些陷入和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济发展予以分析,并得出一些重要结论。

#### (一)需求层面

##### 1.消费占比

从消费占GDP的比重来看,在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后,一些拉美国家如巴西、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以及马来西亚的消费占比均呈下降趋势。巴西1960-1990年的年均消费占比约为67.6%,且总体呈不断上升态势;进入90年代以后,则整体上转为下降趋势,2006年达到历年来最低值56%。智利消费占比的总体运行态势与巴西较为相似,但其消费占比在80年代初期就开始下降,1991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下降趋势更为明显。1960-1980年,墨西哥的消费占比急速下降,80年代曾一度出现小幅上升,但并未逆转整体的下降态势,从而其消费占比从1960年的近80%降到2012年的67%。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消费占比变动情况类似,都是自1960年的消费高峰(均为70%左右)一路下降为2012年61%和65%。作为亚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马来西亚的消费占比下降尤为明显。1960年,马来西亚的消费占比为64%,接下来两年上升至高达67.3%(1963年),之后便一路下滑,1999年达到历史最低值41.5%,2012年也仅为48.8%,远低于起初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和乌拉圭虽然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30多年,消费占比也曾一度下降,但较80年代以前仍有小幅上升,这也许是两国分别于2011年和2010年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的重要原因。

在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日本的消费占比自1960年持续上升,从1960年的49%一路上升到2012年的61%。与日本的走势不同,在1988年以前,韩国的消费占比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60年

的高达83.4%下降到1988年的仅50%,1988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虽有小幅上升,但直到2012年,该占比仍然只有53.5%,始终远远低于1960年的水平。

通过对陷入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样本的分析,可以发现,消费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保持较高的消费率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而消费不足所导致的内需不足可能是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 2.资本形成占比

从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来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除了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资本形成率接近30%外,几个拉美国家的资本形成率普遍很低,均在20%左右;而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在“起飞阶段”的资本形成率基本上都在30%左右,高出前者约10个百分点。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阿根廷、巴西、乌拉圭的资本形成率都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滑,由起初的20%以上下降到了20%以下,阿根廷1983-2012年的年均资本形成率仅为18.8%,巴西1990-2012年的年均形成率仅为18.3%,而乌拉圭1980-2012年的年均资本形成率更低,仅为16.2%。进入“起飞阶段”后,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的年均资本形成率均在波动中小幅上升,但始终在20%上下徘徊,没有突破30%;其中,智利、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分别于1997年、1981年、2007年取得最大值,均为27%,哥伦比亚2008年的资本形成率达到历史最高,为24.4%。日本于1973年步入“起飞阶段”,其时资本形成率高达37.9%,此后,其资本形成率整体呈下降态势,但在整个“起飞阶段”均未低于30%;韩国1987-1995年期间,资本形成率均在30%以上且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从1987年的30.3%迅速提高到1995年的37.7%,最高时还达到1991年的39.7%。

由上述分析可知,投资作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可或缺,投资不足可能是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 3.政府支出占比

从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总的来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对高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和地区中,香港“起飞阶段”的年均政府支出占

比仅为6.4%,韩国为11.4%,日本略高,为13.7%。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国家中,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进入“起飞阶段”后的年均政府支出占比分别高达19.8%、16.1%、14.5%,三者均高于同一阶段的日本、韩国和香港;阿根廷、智利、墨西哥、马来西亚的年均政府支出占比约为11%~12%,接近或超过同阶段韩国的水平,更远远高于香港;乌拉圭“起飞阶段”的年均政府支出占比为13%,与同期日本的水平相当。相比较而言,即便同处于“起飞阶段”,日本、韩国和香港的经济实力仍然远高于同期的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政府支出所需的财政收入支撑也更为雄厚,然而,后者的政府支出占比却远高于前者,表明后者可能采取赤字财政方案,具有明显的“福利赶超”的特征。因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一国的福利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限制相适应,违背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现实的政府支出政策是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 4. 外贸依存度

总体来讲,进入“起飞阶段”后,无论是陷入还是跳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外贸依存度都呈稳步上升趋势,说明国际贸易在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韩国的外贸依存度代表了该组大部分国家的平均水平,约为50%~60%,且呈持续上升态势。然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呈现两极分化的特征:有些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其外贸依存度很低,虽然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之后有所提高,但涨幅不大,这说明其外贸水平较低,无法起到促进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作用;有些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和马来西亚,其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外贸依存度竟然高达187.6%,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意味着该国的对外贸易过度发展,会因过度依赖外需而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在长期中必然难以为继,最终它们的外贸依存度纷纷下降,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逐渐下降。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适度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之一。贸易发展不足或者发展过度都是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原因。

表1 经济增长动力——需求方面 单位:%

	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的时间	消费占比	资本形成率	政府支出占比	贸易依存度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阿根廷	1983	65	24	10.1	13.2
		67	18.8	11.1	26.8
巴西	1990	67.6	21.2	11	15.9
		61.6	18.3	19.8	21.9
智利	1991	67.2	18.3	12.4	40.1
		62.2	23.6	11.2	63.7
墨西哥	1981	72.6	21	8.1	18.5
		67.4	21.6	10.7	44
哥伦比亚	2005	70.4	19.1	10.9	30.3
		63.4	22.6	16.1	36.6
哥斯达黎加	1994	71.1	20.5	13.7	63.5
		67.8	20.9	14.5	90
乌拉圭	1980	65.2	18.6	13.3	30.2
		70.8	16.2	13	45.2
马来西亚	1992	58.3	23.4	14.8	96
		45.9	28.3	12	187.6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不包括中国大陆)					
日本	1960-1972	50.1	36.6	11.2	19.5
	1973-1981	53	32.9	13.7	24.7
韩国	1960-1986	70.2	25.2	11.2	47.8
	1987-1995	58.4	35.6	11.4	58.5
香港地区	1965-1976	66.2	25	5.6	162.4
	1977-1988	60.7	28.3	6.4	194.2
中国大陆	2008	48.9	33	12	30.8
		34.8	47.5	13.4	54.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表中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的年份之后便是“起飞阶段”,也是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

## (二) 供给层面

### 1. 技术进步

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成品出口的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的生产技术进步情况。考察可知,大部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都很低,且多年来几乎没有增加。智利在1991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自此之后,直到2012年,其年均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仅为3.9%,2012年该占比为4.6%,甚至比1990年的4.7%有所下降;与之类似,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年均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也很低,分别约为7.2%和6%,而且呈下降态势,2012年该占比分别为7.7%和5.1%,分别略低于1992年的8%和1991年的5.2%。乌拉圭1993~2012年的年均高技术产品出口仅为3.6%,近几年虽然有所上升,但仍未达到10%;巴西1989年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仅为6.3%,在进入“起飞阶段”后,曾一度上升,并于2001年达到最高值19.2%,但之后便逐年下降,到2012年仅为10.5%,1989~2012年23年间该占比仅仅提高了4.2个百分点;与巴西

相似,墨西哥和马来西亚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也曾在“起飞阶段”一度上升,然而,之后两国该占比便直线下滑,2012年分别为16.3%和43.7%,比1988年各自的相应值分别仅提高了3.1%和6%,正因如此,两国高技术出口占比虽然较高,接近甚至高于一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但始终无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与上述国家恰恰相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相对较高,特别是韩国,它1987年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1988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为15.9%,在整个“起飞阶段”持续上升,到2000年该占比已达到35.1%,比1988年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尽管此后在波动中有所下降,但直到2012年该占比仍为26.2%,较1988年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生产技术落后或进步迟缓可能是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 2. 教育投入

在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方面,从表面来看,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教育支出占比接近或者高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尤其是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它们的教育支出占比均在4%以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陷入国家比跨越国家的实际教育支出更多或受教育条件更好。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平均教育支出占比也在不断提高。20世纪70年代,当跨越国家进入“起飞阶段”时,世界平均的教育支出占比为3%左右,以日本为代表的跨越国家的年均教育支出占比均在4%以上,比世界平均水平至少高出1%;20世纪80年代以后,陷入国家相继步入“起飞阶段”,世界平均的教育支出占比逐渐上升到4%以上,大多数陷入国家的教育支出占比在3.6%~4.7%之间,比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仅高出0.5%左右(李红艳、汪涛,2012)。另一方面,相对而言,跨入国家的GDP总额远远高于陷入国家,即使是相同的教育支出占比,前者的实际教育支出总额也远远大于后者。更何况,一旦考虑人口因素,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人均受教育质量显然极大地落后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

正因如此,本文得出结论:一国受教育水平是劳动力素质的重要决定因素,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教育投入不足是中等收入国家陷

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 3. 制度质量

腐败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的公共部门治理能力和宏观经济环境,得分越高表示公共部门效率越高。从表中可以看出,大多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腐败指数普遍不超过5,相对低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说明前者的制度质量比后者差。其中,墨西哥和哥伦比亚2000年的腐败指数分别为3.7和3.8,之后呈现下降趋势,分别下降到2012年的3.4和3.6,表明两者的公共部门治理能力下降了;阿根廷和巴西的腐败指数也曾逐年下降,虽然近几年有所改善,但几乎与2000年持平;智利的腐败指数虽然很高,但从2000年开始便一路下滑,到2012年已经降为7.2,比2000年7.5下降了0.3个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地区中,中国香港和日本的腐败指数尤其高,且近十几年来一直处于平缓的上升之中;韩国的腐败指数得分虽然低于前两者,但上升速度却很快,2000年其腐败指数为4.2,到2012年已达到5.6,提升了1.2个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乌拉圭的腐败指数不仅得分较高,而且自2000年以来飞速上升,已经从2000年的5.1攀升到2012年的7.2,这或许是乌拉圭能够突破1万美元大关、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再次证明了:制度质量(政府部门的治理能力)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可或缺。

表2 经济增长动力——供给方面

	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	教育支出占比	腐败指数 <sup>①</sup>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阿根廷	7.2	3.6	2.9
巴西	10.2	4.6	3.8
智利	3.9	3.5	7.2
墨西哥	16.9	4.1	3.4
哥伦比亚	6	4.3	3.7
哥斯达黎加	35.5	4.7	4.8
乌拉圭	3.6	2.6	6.3
马来西亚	48.1	5.5	4.9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不包括中国大陆)			
日本	23.4	4.8	7.4
韩国	26.6	3.5	5.1
香港地区	16.8	2.3	8.2
中国大陆	20.6	1.9	3.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除了上文所分析的各项因素,一国的科研投入、金融发展水平、贫富差距等也会影响一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由于数据缺失,本文无法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因而无法确定它们在中等收入阶段上差异和作用。不过,通过总结一些陷入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窥探其影响。一般而言,一国的科研投入越高,意味着该国的创新能力较强,创新能力作为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效用;创新能力不足可能是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一国金融发展水平越合理,资本市场越完善,则为本国企业提供融资的资金和技术基础越雄厚,从而能够带动实体经济的健康高效发展;金融市场发展不足或发展过度都会成为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一些研究显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贫富差距都很大,其基尼系数大都超过了50%,而跨越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在30%左右,贫富差距相对较为合理。

## 二、经济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由于缺少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产生的经济发展停滞的状态。

而经济转型的重点就是挖掘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建立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机制。因此,经济转型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也是势在必行。

### (一)经济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逻辑

经济转型(Transformation)既不同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Transition),也有别于发达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而是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后的体制机制完善过程 and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洪银兴,2006;杨斌、刘晓宾,2012)。经济转型意味着要改变甚至舍弃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转而采取与现今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转型意味着追求均衡增长。这里的均衡,是指宏观意义上投资、消费和外贸之间的平衡关系。转型在于从过度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向投资、消费、贸易相对均衡发展模式转变。其次,转型意味着追求高效率的增长。也就是说,要合理运用和配置各种生产要素,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最后,经济转型意味着

追求包容性增长。即经济转型是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由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同时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等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新的增长目标和方式的追求实质上是为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因而经济转型无疑成为中等收入国家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方式。实际上,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指出,一国的经济发展会经历六个不同阶段,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所需的增长驱动因素是不同的,如果一国能够认清不同阶段的具体经济现实及其差异性,并据之在不同阶段之间转变发展战略,创造经济发展所需的条件,则能够避免“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之类的困境,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历史上那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日本、“亚洲四小龙”等——都曾在“起飞阶段”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和转型措施,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起飞”,顺利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图1更为清晰地显示了经济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逻辑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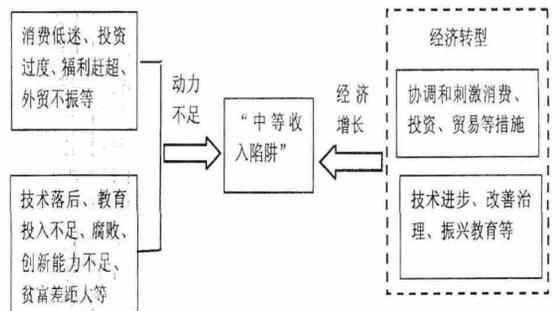


图1 经济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内在逻辑

###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基于“中等收入陷阱”视角

200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进入了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高度敏感期。结合前文的分析,如果中国确实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性特征,则必须进行经济转型,采用新的阶段性发展战略,以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1.从需求方面来讲

在消费方面,从表1可以看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均在50%以上,且仍然在增加,而2008~2012年,中国的年均消费占比仅为34.8%,比前者低约15个百分点,甚至比大

部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要低。不仅如此,自1970年以来,中国的消费占比就呈直线下降,消费占比由1970年的63.3%下降为2012年的仅34.2%。可见,中国的消费是严重不足的,如果不进行经济转型,采取措施提高消费率,则消费不振可能成为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在投资方面,大部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而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却高达47.5%,不仅远高于陷入国家,而且比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高出十几个百分点。不仅如此,1960年~2012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在波动中缓慢上升,从最初的35.5%上升到了2012年的48.8%。毫无疑问,投资曾在日本等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经济迄今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离不开投资的驱动。然而,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导致我国的消费严重不足,需求结构长期失衡,更严重的是,目前投资的边际贡献率在逐年下降,不宜继续保持太高的占比,调整和转型势在必行。

在政府支出方面,进入“起飞阶段”后,我国的年均政府支出占比约为13.4%,与大部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水平相当,并未出现陷入国家曾经出现的“福利赶超”问题。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中国的政府支出占比相对较为合理。

在贸易依存度方面,2008~2012年,中国年均贸易依存度约为50%,与跨越国家进入3000美元关口的平均水平没有太大差别,也不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那样,出现贸易发展水平过低或过高的问题。不过,现在相对较为合理的贸易依存度并不是中国主动转型的结果,而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被迫下降,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实际上,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持续上升了30多年,前几年曾一度达到70%以上。考虑到这些年中国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人民币升值势头不减,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在逐渐削弱,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显然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因此,需要改革现有的贸易模式,推动其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使对外贸易成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驱动力。

需求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需求结构的失衡问题,为了避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调整消费、投资和外贸之间的关系,从而使需求结构更加平衡。

## 2.从供给方面来讲

在技术进步方面,中国进入“起飞阶段”后,年均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约为20.6%,虽然略高于大部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但却低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当时阶段的平均水平,说明我国的技术进步较之发达国家落后了至少30年,尚需很长的赶超道路。更严重的是,近10年来,我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竟然处于下降态势,从2005年的30.5%下降为2012年的26.3%,这与跨越国家该占比不断上升的现状差异较大,表明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鉴于技术进步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条件,我国必须尽快采取经济转型战略,推动技术赶超和技术进步之路,方能顺利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跨越。

在教育投入方面,中国2000年以前的年均教育支出占比仅为1.9%,目前该占比也不到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跨越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很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的年均占比。这说明我国的教育投入是严重不足的,这也是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并可能成为制约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制度质量方面,中国的政府腐败一直是受国际诟病的主要问题之一。2000年以来,中国年均腐败指数得分仅为3.5,甚至低于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与日本、中国香港这样的高得分国家/地区之间的差距更大。制度质量关乎公共部门的治理能力,更会影响企业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那些政府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引以为戒。也正因如此,经济转型必须秉着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将公共部门治理能力的提升作为经济转型的目标之一,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举措之一。

供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增长效率低下的问题,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改善要素投入结构和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

###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转型路径

综合上述分析,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现实已经显现出很多诸如陷入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特征,因而经济转型十分必要且刻不容缓。关于中国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按照严重性程度,主要表现为消费不振、技术落后、教育投入不足、公共部门治理能力薄弱等方面,因此这些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其他因素如贸易竞争力下降、贫富差距拉大、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等方面的问题相对较弱,但也不容忽视。

#### (一)需求方面——平衡需求结构

经济转型在需求方面就是要平衡需求结构,进一步地,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就是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目前,中国的投资过度且效率低下,而出口绩效又因全球经济危机严重受损,因而消费应当成为今后扩大需求的主要措施。为了缓解消费拉动不足问题,需要从提高国内居民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意愿着手。与购买能力密切相关的便是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首先,加快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中要逐步提高劳动收入的份额,在再分配中份额应向居民倾斜,形成国家、企业、居民之间的合理分配体系,这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途径。其次,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中等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78年的0.28上升到2009年的0.49,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表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且其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居民消费扩大的重要诱因。政府要运用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优化收入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此,要进一步完善收入所得税、遗产税等税收征收体制;扩大政府转移支付,提高城乡居民最低收入标准;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引导和扶持力度,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就业、教育等条件。为了提高居民的购买意愿,一方面,加快构建规范、优质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居民提供完善的教育、医疗、失业等保障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对市场波动的掌控和应对能力,

规范物价形成机制,尽可能避免物价的大起大落甚至恶性通货膨胀。

鉴于目前投资和外贸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所以在适度降低投资比重和外贸依存度的同时,也要采取措施提高投资报酬率和增强外贸竞争力。为了提高投资报酬率:其一,努力打破国有企业垄断投资的局面,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加入项目投资和建设,通过竞争机制和优势互补提高投资效率和回报;其二,严格投资项目的遴选和审核,避免重复投资、“扎堆”投资等情况,同时要加强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和评估,以期选择低成本、高收益的项目;其三,注意投资与消费的密切结合。投资在投入之时会带动需求,但在完工之后则会提供供给,因此必须找准投资和消费的结合点,尽可能地使投资服务于满足消费需求。为了稳定和扩展对外贸易,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首先,政府应当提供出口信贷、补贴、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扶持,简化贸易程序和管理制度,以降低贸易成本;同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积极加入全球或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赢取有利的贸易环境。其次,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替代国际贸易,培养一批综合素质好、竞争力强、影响力大的跨国公司,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最后,从根本上来讲,企业应该努力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努力向全球产业链高端转移;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和技术含量,有序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带动国内服务业竞争力提升。

#### (二)供给方面——提高生产效率

经济转型在供给方面就是要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地,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向依靠技术进步的集约型转变。显然,这一转变归根到底取决于技术进步的情况。参照相关的国际经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我国的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第一,加大对教育产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劳动力素质。其一,提高教育和培训支出占GDP的比重,尽早实现初中等教育的全面普及,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使中国的人口发展由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其二,强化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发展,培养一批具有实际操作技术的高技术劳动力。第二,增加对研发的投入与支持力度,增强本国企业的自

主创新能力。一方面,政府应加大财政支出中直接用于研发的比重,支持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企业的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加强产、学、研之间的对接,从而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式吸引私人部门和民间团体参与研发,或者鼓励它们提供研发资金,合力提高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第三,依靠国际市场引进、消化、吸收外国技术来快速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中国可以通过购买或吸引高科技外商直接投资或对外兼并和收购来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以此来促进国内技术进步,但要注意避免形成过度的技术依赖。

公共部门对宏观经济的治理和管理能力会直接影响企业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进而对其微观生产产生重要影响。正因如此,经济转型不能忽略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目标是更好地区分政府和市场的不同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具体来讲,我国应“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应将重点放在为市场发育、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方面。为了更好地发挥我国政府部门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应保持强有力的治理,不为利益集团所左右,不被短期利益所迷惑,保持发展战略的动态适应性,坚持长期发展目标不动摇。另一方面,推进政治制度改革,坚持依法行政,建立科学的、有效的监督和问责体制,从根本上解决腐败和相关问题。

#### 参考文献:

- [1] 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2] 陈昌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几条国际经验》,《广西经济》2011年第11期。  
[3] 代法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经验和对

策——基于44个国家的跨国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14年第2期。

[4] 杜传忠、刘英基:《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及对我国的警示》,《理论学刊》2011年第6期。

[5] 洪银兴:《中国经济转型和转型经济学》,《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7期。

[6] 黄秋菊、景维民:《经济转型与包容性增长的关联度》,《宏观经济》2011年9期。

[7] 李红艳、汪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实证比较及对中国启示》,《产经评论》2012年第3期。

[8] 刘鸿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基于“中等收入陷阱”视角的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12年第4期。

[9] 卢万青、史恰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别比较》,《商业研究》2013年第3期。

[10] 马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7期。

[11] 全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的经验及启示》,《世界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

[12] 王新新:《“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破解对策研究》,《理论导刊》2012年第12期。

[13] 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

[14] 杨斌、刘晓宾:《中国经济转型问题研究综述与政策建议》,《人文杂志》2012年第5期。

[15] 杨磊:《从“中等收入陷阱”谈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生产力研究》2012年第7期。

[16] 杨淑华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发展动力探析》,《政治经济学研究》2013年第00期。

[17] 张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7期。

[18] 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1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福建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蔡 依)